

契合与冲突: 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全球扩展与全球公民社会

涂怡超

提要: 全球遍传福音向为基督教福音派之志,自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基督教福音派逐渐取代主流教会,成为世界传教运动的领头羊。其全球扩展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与巩固,但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全球公民社会发展的障碍。本文旨在厘清基督教福音派与全球公民社会巩固与发展之间的内在契合与冲突。

关键词: 基督教 福音派 美国 全球化 全球公民社会

作者涂怡超,法学博士,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上海 200433)

20 世纪下半叶以来,基督教福音派在全球范围内发展迅猛。在这一过程中,美国福音派组织以信仰为体、组织为用,成为全球公民社会的重要行为主体。与此同时,由于其信仰的内在限制,行动中亦表现出对全球化和世俗化的抗拒。本文旨在分析基督教福音派的全球扩展与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和巩固之间的契合与冲突。

一、观念的契合与冲突

在人类社会生活中,观念可以分为三个层次,世界观、原则化的信念和因果信念。^①福音派的观念在三个层次与全球公民社会的价值和规范既有契合,又存在冲突,是为其双刃剑效应之核心。

(一) 世界观的契合与冲突

福音派世界观根基为其核心神学思想:作为神的知识的一种来源与作为基督徒生活的一种指导的《圣经》的至高权威性;同时作为道成肉身的神和作为有罪

的人性的救世者的耶稣基督的威严性;圣灵的统治性;个人皈依的必要性;福音传道对作为个体的基督徒与作为整体的教会来说的优先性;基督徒社团对灵性的培育、团契与成长的重要性。^②福音派执着于信仰绝对权威性、强调传教、重视发展群体生活,这为全球公民社会确立价值和规范、注意公民社会团体培育的一面;但其核心观念具有排他性,强调个人皈依,在向其他宗教传教实践中往往通过否定其核心教义,进而引导其信徒皈依并不断强化其福音认同;同时对群体生活的重视亦令信仰和组织的内聚性得以强化,这对多元社会、多元宗教形成巨大挑战,易形成全球公民社会的反作用力。

(二) 原则化信念的契合与冲突

世界需要透过原则化信念加以阐释和强化。原则化信念是“包括详细说明区分对与错、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规范性概念”^③。福音派的一些原则化信念一定程度促成其作为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的成长和与其

^{①③} [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10页。

^② [英]阿利斯特·麦格拉思:《福音派与基督教的未来》,董江阳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

他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的认知重叠及有限合作。

劝人改教需要证明福音优越性,这一优越性既体现在教义上,也体现在社会正义上。在此基础上,福音派必须推动其肯定的“公共的善”。福音派对根治社会问题有着极为强烈的道德诉求。几乎所有组织核心声明都将道德和公义诉求列于其中,“贫困者”、“背井离乡者”是其事工重点。本着救援立场,福音派对经济公正、穷国免债等议题予以关注,近年来开始倡议人权问题,强调基本人权,反对人口贩卖和性贸易,试图解决饥馑、艾滋病。其国际网络的发展使这些原则性观念深入全球福音派信徒之心,有利于在更广泛层面上形成全球共识,同时也成为与其它宗教组织、人权组织和各类发展组织合作的基础,进而推动全球公民社会的发展。

福音派的原则性观念在一些具体方面与全球公民社会其他行为体存在重大分歧。

首先,对待意识形态的分殊,福音派在原则性观念上难以调和与基督宗教其他教派、宗派、其它宗教、世俗意识形态的现有分歧,只是有限度的宽容。在实际操作层面,福音派对自由派、天主教、东正教、犹太教可适度宽容,对佛教、伊斯兰教等其它宗教也能有条件地共处和合作,但对无神论的共产主义一直持反对态度。其次,对待人权中的一些具体问题,福音派因宗教信仰而持极端保守态度。福音派以《圣经》逐字无误论为基础,视节育、堕胎、安乐死、婚外性行为、同性恋及干细胞研究为罪,认为激进女权损害了世界基础家庭的利益。对这类问题福音派左右两翼的原则性观念基本相似,区别在于因果信念。再次,对待日趋严重的环境问题,福音左翼对环境问题所持观点与世界各国的环保主义者相近,基本上支持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2007年综合报告的观点。福音右翼则对此问题持两种不同的观点,其中前千禧年时代论者认为灾难性气候是耶稣复临的前兆,为此对气候政策并不关心;而重建派则认为在美国实行神权政治可加速耶稣复临,由此反对基督徒介入环境事务。^①

由此导之,全球共识在以上层面难以形成,从而成为全球公民社会进一步整合的障碍和全球治理的暗礁。

(三) 因果信念的契合与冲突

第三个层次的观念是因果信念,“即关于原因-结果关系的信念。它的权威源自于被公认的精英(无论他们是村庄的长老还是杰出研究所中的科学家)所达成的共识。这些因果信念为个体提供了如何实现其目标的指南”^②。

福音派的因果信念源于《圣经》,更出自福音派精英人物对经典的当代阐释。在美国福音派组织和领袖的大力宣传与游说下,美国的普通福音派信徒在社会和政治参与方面日益积极主动。在世界范围内,福音派的社会和政治参与都在不断发展。在一些情况下,即便是福音派原则性信念一致,其因果性信念也会有所分别。因此,上述问题的解决之道就会在福音派左翼、右翼或温和派领导人的带领下走上不同的进路,或激烈或缓进。

福音派力在推动“公共的善”。从因果性信念来理解“公共的善”,福音派的进路与全球公民社会亦是既有契合,又有冲突,在几个重点议题上尤为如此。

其一是宗教自由问题。福音派认为世界基督教是解决所有社会问题的终极之路,大力发展福音信徒为解决之道,为此汲汲于在世界各非基督教传统地区传教。其全球排他式扩展对原有的社会结构、宗教认同乃至国家认同等产生一定冲击,在传统宗教禁止改教的地区,这类矛盾尤其突出。尽管与其它群体磨擦的原因和后果不一,但很多国外教会被西方福音派认定是“受难教会”。^③对福音广传的强烈渴求和对“受难教会”的关注催发了福音派对宗教自由的极力捍卫。宗教自由仅是福音广传的手段,这成为福音派全球公民参与的结构障碍。

其二是对艾滋病等疾病的解决方案。在艾滋病防治中,“亲生命、爱家庭”的基督教福音派救援与发展组织主张戒绝婚前性行为、反对使用安全套、反对同性恋行为。为此与一些世俗组织产生严重观念冲突。近年来,由部分福音派组织领导的疾病教育和预防项目推动了有关疾病的神学思想社会化,甚至对所在国政治产生影响,目前在乌干达已现端倪。^④

其三是对待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态度。持前千禧年观的福音派对世界统一体之类的机制有着本能的警

① Kevin Philips, *American Theocracy: The Peril and Politics of Radical Religion, Oil, and Borrowed Money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Viking, 2006, p. 66.

② [美]朱迪斯·戈尔斯坦·罗伯特·基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第10页。

③ 福音派的权威宗教自由机构——世界福音同盟宗教自由委员会就认为:“世界有2亿基督徒未能享有充分的宗教自由。”
<http://www.worldevangelicalalliance.com/commissions/rloc/> (Jan 2, 2007)

④ 2009年提出、仍在乌干达议会审议中的《反同性恋法案》,在国际社会广受争议和谴责。而这一法案的提出与美国基督教保守福音派渊源甚多。

惕,因此对以联合国为代表的国际政府组织顾虑重重。由于害怕“国际新秩序”,一些福音右翼怀疑国际参与导致美国的主权并入联合国,并最终并入敌基督的世界政府。^①

其四,福音派认为信徒应根据自身自由意志服从神的意旨。当民主程序无法达到既定目标,从而无法实现神旨之际,则以公民不服从的名义违法,将信仰置于法律之上。美国福音派深信美国政府是民主的灯塔,在国外采用公民不服从,如违反当地法律或国际法走私圣经、空运物资至它国等。

福音派的全球扩展令众多组织和信徒在全球众多地方不可避免地遭遇众多社会问题,世界的现实状况并未改变其原则化信念,但对因果信念产生强烈冲击。因此,福音派在把神学教义转换成当代福音派行动指南的过程中,对一些因果性的信念有所修正,这在客观上与全球公民社会所必须的重叠共识更为契合。

二、福音派国际网络的扩展与全球公民社会之间的契合与冲突

(一) 福音派组织成为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

21世纪初福音派信徒总数超过世界人口的1/6。福音派信仰和组织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广泛嵌入,甚或成为众多地区的主流信仰和公民社会基础组织。美国福音派通过宗派所属传教组织及跨教会传教组织、救援和发展组织、进行海外传教培训的美国各类神学院、各类进行海外参与的本地教会进行全球扩展。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借助英语在国际交往中独特的地位,美国福音派高涨的传教热情、强大的经济后盾与各类传教、救援和发展组织密布全球的网络紧密结合,通过电影、电视、广播、网络、图书、杂志等各类媒体,采取遍及全球的布道会、救援、发展和教育等多类方式,其触角已直接或间接伸入世界各地,诸多偏远角落都深受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葛培理(Billy Graham)等福音派领袖的组织下,福音派完成了神学和社会参与基本思想的整合,也从世界福音派领导人、各国福音派教会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各地福音派教会和非政府组织领导人、草根布道者一级级完成组织和人员上的整合,建成以美国为中心的福音派全球网络。

由此,福音派作为跨国行为主体获得在全球公民社会的行动空间。众多福音派组织,尤其是福音右翼,曾长期认为联合国是“敌基督”而排斥这一组织,在全球化不可抗拒的今天则活跃于联合国及各类国际组织,积极扩大自身在这类组织中的地位和影响,赢得话语权,希冀进一步将福音派的神学、社会和政治观点裹挟到全球化的进程中,对世界各地产生影响,成为全地归主的先声。近年来,美国福音派救援与发展组织在联合国层面发挥的影响亦在不断增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将以信仰为基础的组织列入公民社会组织(CSOs)的范畴,主要在脱贫、防艾和救灾等领域开展合作。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看重以信仰为基础组织广泛的草根群众达及能力,在人口和发展问题,包括人权、卫生保健、妇女权利、青少年权利、人道主义援助和防艾等领域开展合作。多个美国福音派组织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长期合作,在亚非拉国家从事卫生保健、儿童教育、抵抗儿童性贸易和童工、争取儿童权利和防治艾滋病等方面的工作。^②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与15个大型非政府组织签订全球谅解备忘录,其中美国福音派组织有世界宣明会和饥援会等。^③世界宣明会成为联合国经社理事会具正式咨商地位的非政府组织。^④一些福音派组织亦与世界银行等其他国际组织开展合作,对各类国际组织的影响亦在不断增长。

(二) 与全球公民精神培育之间的契合与冲突

每一个福音派信徒都或深或浅地嵌入到福音派国际网络中,而福音派国际网络早已深嵌至全球公民社会。因此众多福音派信徒成为全球公民社会行为体。

福音派的救援和发展工作也有助于福音派信徒全球公民精神的养成。在世界各地出现天灾人祸之际,福音派各大型国际救援与发展组织均在第一时间作出快速反应,加入到抢险救灾工作中去。福音派信徒则通过两种方式为救援和发展做出贡献。其一,大小不等的捐款成为资金主要来源;其二,信徒全职或兼职志愿服务于福音派机构或其它世俗机构。世界范围的救援和发展工作极大地促进了文化沟通,也促进了不同宗教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理解,一定程度上为福音派全球公民意识培育提供跨越国家、地区、宗教、种族和文化的平台。

① 福音右翼领导人帕特·罗伯逊就认为,联合国和其它国际组织正在从事的战略会导致“一个世界性独裁政权”。Pat Robertson. *The New World Order*. Dallas: Word Publishing, 1991. p. 54.

② UNICEF Press Center, “Sharing common goals: UNICEF, faith-based organizations and children,” http://www.unicef.org/media/media_4537.html(2010/6/6).

③ 信息介绍,“非政府组织对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的重要性,”<http://www.wfp.org.cn/AboutWFP/Partners.html#e4>, (2010/5/1.)。

④ 资料来源:<http://www.un.org/esa/coordination/ngo/> (2010/6/6)。

基于福音派全球信徒人数和庞大的国际网络,福音派信徒全球公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有助于进一步推动各国公民全球公民精神的形成。但原则化和因果信念褊狭又成为福音派、尤其是右翼养成更为多元和宽容全球公民精神的障碍。在实践中,宗教和文化差异成为福音派全球扩展的重要障碍,对“敌基督”的敌视在其宣传中时有出现。

(三) 与全球公民技巧培育之间的契合与冲突

福音派国际网络一直将教育和培训列为海外工作重点,通过教育和培训为福音派组织输送更有效的人才、提高个人灵性水准。这客观促进了福音派网络各组织和个体信徒公民技巧及社会参与能力的提高。此类教育和培训层次有二。

其一是一个体信徒层次的教育和培训。一为纯粹的福音派神学教育,这对能增加信徒对信仰的理解、通过这类培训扩展其社会网络,但对公民技巧方面帮助有限;其二将信徒培训成为熟练的平信徒布道同工,再经实践磨练提高公民技巧,很多人日后成长为各类社团领袖。众多福音派组织均在世界多国多地举办这类基层培训。妇女、儿童、青年等群体都是福音派教育与培训的重点所在,同时,他们还针对一些特殊群体,如囚犯、残疾人等进行教育和培训。这类培训覆盖面广,参与人数多,有助于社会整体公民技能的提高。

其二是福音派组织对各类福音派团体领袖和未来领袖的教育和培训。自1974年以来,洛桑世界福音化委员会一直致力于举办国际性培训,或在全世界各地举办对当地各福音派团体领袖及未来领袖的培训,组织世界及当地的著名福音派领袖及学者发表主题演说;召开解决事工或各类社会问题的研讨会,对现有问题各抒己见,并协同制定实施方案。在培训和实践中,国际性交往网络的建立亦成为处理跨国事务的平台,由此福音派宗教资本嵌入各福音派信徒及组织本身,福音派的全球化精英不断涌现。

三、全球公民社会中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组织的困境

美国福音派的诸多全球性行动令第三世界国家多有受益。然而,由于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三个层面的观念歧异,今天的美国福音派组织在全球公民社会中仍处于一定困境。

悖论之一:现实问题与以信仰为源泉的解决之道。

在世界根本问题解决上,认为全地归主、世界基督化是耶稣复临的前奏,因此大力推动在全世界各地、向各类人群的传教,却因此而引起改教与反改教的世界性的冲突和拉锯。世界宣明会、撒马利亚基金会、饥援会等多个巨型福音派救援与发展组织均因在世界多地将救援与改宗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长期受到多方舆论批评。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从信仰出发提出不切实际的解决之道,如实施通过禁欲减少发展中国家艾滋病、卖淫及跨国人口贩卖的计划、认为将中东的“敌人”转化成基督徒可解决中东现有的冲突等。

悖论之二:西方视角与非西方问题来源。美国基督教福音派为众多政治和社会议题提供了视角、解释和解决范式,以及所需的资源。而非西方世界的福音派信徒则往往成为议题的提供者。持西方视角的美国福音派对来自第三世界国家议题往往通过外力,如促成美国政府有针对性的外交政策、国际政府组织的决策、推动国际法的成型和实施等来解决问题,而忽视了问题的根本解决需要其固有的文化、社会机制和政治体制才能对此完全消解,这容易成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来源。此外,美国基督教福音派往往为发展中国家某些群体代言,其中一些群体将政治和社会问题用宗教包装,通过宗教渠道谋求外部势力协助解决,这无疑使福音派的某些跨国参与存在与其他国家的各级政府或当地社会对抗的内在可能性。

悖论之三:信仰与妥协政治。宗教价值观转换成政治信念,需要完成宗教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因果信念的层层转化。而将抽象、超越而绝对的宗教世界观转换成具体情境中的成功政治策略殊非易事。首先,从宗教观念到社会和政治参与的策略并无一成之规。一位批评教会政治行动主义的学者曾把这样一句话钉在学院教堂大门上:“就我所知,无人知道上帝在外交和国内政策上的观点。”^①因此,对此的解释在教会内部也是见仁见智。往往政治策略的提出成为群体内意见分化的先声。福音派策略的分化就导致了福音左翼与右翼的分化。而各类歧见也在不断导致福音团体的分化和重组。这又对福音派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形成侵蚀。其次,政治是一门妥协的艺术,而宗教,尤其是亚伯拉罕系宗教有着信仰的坚硬内核,其中福音派尤为如此。妥协在世俗团体招致的非议远小于于宗教团体。妥协的行动往往遭受其他宗教行动者的非议,认为会因为过于迁就政治操作而牺牲了信仰本身。过

^① [美] 艾伦·D·赫茨克:《在华盛顿代表上帝——宗教游说在美国政体中的作用》,徐以骅、黄凯、吴志浩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1、123页。

多妥协削弱成员对组织的效忠,不妥协却又无法开辟达成政治理念之路。而宗教团体则往往在此十字路口而进退维谷。

悖论之四:议题解决的路径——国际机制还是国家霸权。尽管联合国及其它国际政府组织在全球公民社会中处在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但在一些方面仍效力有限。此外,基于对美国及西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的参与仍倚重以美国等西方主权国家提供的制度空间。在近年来福音派对全球事务的卷入中,美国国会和政府承担了极其重要的仲裁者和执行者的双重角色。在美国,福音派国际网络捕捉的议题一般通过国会介入美国外交政策,通过外交政策的实施完成。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1998年国际宗教自由法》及其它法律均沿由此进路。由此,福音派众多跨国社会及政治参与又落回国家层次,转而依靠美国的世界霸权以达到目标。实质上反映了身为全球公民社会主体的美国基督教福音派组织对强权、而不是国际机制的依赖。

结 语

在美国福音派的带领下,福音派已从国际体系的边缘向中心运行,对国际制度的态度亦由初始时的抗拒逐渐转向今日的接受、乃至力争发挥引导作用。福音派向以“世界基督化”为目标,就此而言,福音派积极倡导全球化,其全球组织、事工和信仰的扩展均为例证。但是,“敌基督”的全球化是福音派的仇敌。“福音派自认是‘世界基督徒’,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认可在一些议题上建立全球性宗教一致的多元信仰的种种尝试。他们宁可在全世界坚持其特殊神学。”^①当今世界的性解放、妇女解放及世俗政策激起了福音派等珍视

“传统价值”群体的强烈反弹。在福音派对福音式全球化抱有殷切渴望的同时,对带有强烈世俗或自由色彩的全球化如临大敌。美国福音左翼通过代表穷人和边缘人群的利益来响应多元主义;福音右翼则更多显示出对多元文化和多元宗教的拒斥。当福音左翼开始为穷国债务减免和环境等原本为自由派的传统议题而进行全球动员之时,福音右翼则从道德这一伦理观念着眼、家庭这一微观单位入手,将国内政治议题国际化,并联合其他国家宗教右翼,在国际政治层面为捍卫其传统家庭价值而奔走呼告。

宗教主张在道德、伦理领域具有绝对的权威。但是,这种绝对的权威只存在于宗教宗派或团体之内。在此之外,宗教只享有影响力,而不是权威。以天主教、福音派为代表的一些教派、宗教运动或宗派一直致力于将这种道德和伦理的内部权威外溢到整个国际社会。当今世界的重要特征就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这与某一宗教或宗派强烈的诉求既有内在契合,又存在内在冲突。在多中心的世界中,以宗教信仰为基的组织往往有其局限性,从而对全球公民社会产生反作用力。全球公民意识的形成可以增强人们之间的相互依存。然而,如果不同信仰的人们固持己见,并不妥协,又可能引发冲突甚至战争。然而,在不同宗教乃至同一宗教内部推动认知共识困难重重,全球认知共识的形成却可能需要一些宗教以牺牲其核心信念为代价,这是宗教本身无法承受之重。从这一角度来看,宗教的全球化一方面有利于全球公民社会萌芽与发展,却又可能成为全球公民社会最终成熟的巨大障碍。

责任编辑:田明孝

^① Harriet A. Harris, "Theological Reflections on Religious Resurgence and International Stability: A Look at Protestant Evangelicalism," In K. R. Dark ed. *Relig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2000, p. 28.